

DOI: 10.16858/j.issn.1674-0092.2022.05.009

唐文治教育思想对古代文学教学的启示

黄立一

(华侨大学 文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21)

摘要: 唐文治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工学先驱、国学大师,其创立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培养了一大批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领域的一流学者。无锡国专强调修身立志,根柢学问,优游涵泳,会通中西,持经达变,契合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需求,其教育理念与教学方式对当下古代文学教学仍具有深刻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唐文治; 古代文学教学; 无锡国专; 教育理念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092(2022)05-0048-04

现代学术史上,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形成是建立在西方理论范畴基础之上的,但相较于其他学科,仍有着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研究传统。自学科创建70多年以来,古代文学研究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既保持了传统治学的纯正,又不断融合其他学科的视角、方法及最新成果推陈出新。正如戴伟华先生所说,守正与创新互为融通^[1]。而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离不开一代代学人的开疆拓土,学问的传授、学术的传承、学脉的建立、学风的涵养,显得尤为重要。

唐文治(1865—1954),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工学先驱、国学大师,创办私立无锡中学(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前身)及无锡国专(苏州大学前身),著作有《茹经堂文集》《十三经提纲》《国文经纬贯通大义》等。其创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虽旨在“复兴国学,保存国粹,文化卫国”,并不仅限于文学一门,但其不到三十年间培养了蒋天枢、吴其昌、钱仲联、马茂元、曹道衡、冯其庸、王绍曾、江辛眉、吴则虞、周振甫、姚奠中、吴孟复等一大批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领域的一流学者,其教育理念与教学方式对当下古代文学教学仍多有启示意义。

一、立身以诚,志在治平

唐文治先生成长于同、光之际,服膺本地先哲、江南明末清初大儒陆桴亭(名世仪)之学说,业师王

紫翔和南菁书院黄以周、王先谦等晚清理学大师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综融程朱陆王,不仅推尊朱子,在《朱子学术精神论》中说:“余尝谓:居今之世,欲复吾国重心,欲阐吾国文化,欲振吾国固有道德,必自尊孔读经始。而尊孔读经,必自崇尚朱学始”^{[2]1573}。也吸取阳明“良知”学说,王阳明《传习录》云:“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3]。唐文治因之而言:“良知良能泯,而国性日益消除,杀机洋溢不可胜数。”^{[4]400}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并不像一般理学家那样探讨抽象的“诚”和“良知”,而是将之落到实处,一改明代以来心学之空疏淡漠,而立志修齐治平。面对衰世乱局,他以救亡图存正人心保国粹为要务。他视理学为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他在《紫阳学术发微》中指出:“国家之兴替,系乎理学之盛衰。理学盛则国运昌,理学衰则国祚灭。人心世道恒与之为转移”^[5]。可见其是将倡导理学与拯救国运联系起来的。

无锡国专建校之初,唐文治为之制定“学规”:
“综览历史,理学盛则世道昌,理学衰则世道晦,毫发不爽。吾辈今日唯有以提倡理学、尊崇人范为救世之

收稿日期: 2022-04-26

作者简介: 黄立一,男,福建泉州人,华侨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标准”^[4182]。“九一八”事变后，唐文治在国专膳堂挂了一块匾，上面写道：“世界龙战，我惧沦亡，卧薪尝胆，每饭不忘”^[6]。在这样的教育理念引导熏陶下，学生也大多以忧时济世自命。1931年钱仲联在注黄遵宪《人境庐诗草》时，正值日本侵占我东三省，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之际。他在《人境庐诗草笺注》1936年初版本自序说：“俯仰伤怀，时读古今爱国诗歌以自壮。而黄先生人境庐一集，虽经乱犹存行篋，则尤反覆讽诵，而有得焉。”^[75]冯振为钱注所作的序中即入木三分地指出：“公度诗感喟国事，泪痕血点，沾胸沁臆，足以激发末世人心，为救亡之一助，是尤注者微意所在，而读者当深会之矣。”^[72]

在今天，古代文学专业培养方案的设计更着重于专业研究技能的训练，这既是受到西方学科规范的影响，是学科发展的自身要求，也是大的时代氛围中专业主义弥漫的体现，但在某种程度上却抛弃了中国自古以来“尊德性而道问学”的传统。其实就古代文学专业而言，要做第一流的学问，须有第一流的心胸。其中一个原因即古代文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古代的文学作品和创作这些作品的人，这些人往往有高远的情怀——这是由古代文学的性质及其创作者阶层的主要构成所决定的——由这种情怀贯注凝结的作品才得以不朽，成为经典；也即清人沈德潜《说诗碎语》所说的“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8]。因此不仅创作者要有这样的襟抱，研究者同样需要，这样对其人其作才能有真正的理解。试想，钱仲联先生如果没有求学无锡国专期间培养起来的淑世情怀，他怎么会黄遵宪诗歌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有如此深刻的理解，从而在青年时期即注出《人境庐诗草笺注》这样的典范之作呢？今天新的时代提出了新的课题，古代文学研究不仅要有有益于世道人心，也须“自觉承担起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的现实使命”^[9]，重拾中国素有的并由唐先生所发挥贯彻的“尊德性而道问学”的传统，无论对学生学术志趣的提升，学术心胸的涵养，还是增进其对古人及其作品的“理解之同情”，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值得古代文学专业教育者深长思之。

二、强调根柢，汉宋并重

唐文治既推尊理学，又得桐城文论之沾溉，远接唐宋八家，近续桐城、湘乡。因此，他服膺姚惜抱所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统一的观点，并以“义理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10]。陈尚君先生在《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纪念唐文治先生150周年诞辰》一文中说唐文治，“治经学，希图剥

除汉宋学者繁琐考据与率意发挥之迷障，追寻孔孟学术之本真”^[11]。

因于这样的治学理念，唐文治的教学也是汉宋并重，并以道德精神统一之：“以吾心中之精神，感动天地间之神明，即以感人心中之神明。汉学家之考据名物，宋学家之穷理尽性，罔非精神之所推衍”（1947年《无锡国专校友会春季大会训辞》）。在这一点上，无锡国专与同时期的清华国学院、中研院史语所教学路径显然不同。后二者治学提倡继承汉学的乾嘉考据之学，进入20世纪得与西学融合转型成现当代学术之范式，在今天的古代文学研究中更趋主流。而宋学好谈义理，乃至如心学流于空疏浅薄，自清初以来多为学者所批判。但宋学其实有不可替代之价值，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精神追求和人格高度，而且也指出学术形上一途。值得指出的是，唐文治重理学而不废汉学，虽与治经素扬汉抑宋的章太炎观点有所抵牾，但仍多次邀其到校讲演。又派钱仲联与唐兰、王遽常、吴其昌、毕寿颐等几位同学，先后到苏州从汉学家曹元弼学《仪礼》《孝经》。

唐先生还十分注重根柢学问，无锡国专在教学中重视诵读原著，为学生所列的通读书目均为原典，经史子集四部如四书五经、前四史、《老》《荀》《庄》《墨》乃至《汉魏百三名家集》《昭明文选》等都在通读之列^{[12][73]}。唐文治以“厚植基础，博览专精”为训导，提倡学生精研国学元典，规定每位学生至少记诵古文五六百篇。并且无锡国专授课范围还涵盖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地理、艺术等诸多领域，可以说是以“国学”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化学问^[3]。

这些教学思路和举措对于今天的古代文学教学的启示是多方面的。第一，偏于“考证”的文献功夫和偏于“义理”的理论建设不可偏废。左东岭先生在谈到古代文学研究者所应具备的现代学术素养时说：“传统汉学的考据方法与理论思辨的方法要同时兼备”^[14]，与唐先生所倡导的汉宋并重不谋而合。

第二，要注重经典文本的解读，注重学问根柢的培养。当下学术研究从传统向现代转换，互联网和古籍数字化技术为信息检索提供极大的便利，发掘出许多新的材料，建立了材料之间以前靠人力所难以发现的新的联系，促生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但也产生一些新的问题。以关键词检索取代传统的读书治学，数据库研究思维成为研究者的新思维，往往造成对具体文本和整体文化语境割裂乃至扭曲的理解。因为人脑运作功能的复杂性，研究者如有较为扎实的学养，可以在有意无意间建立各文本的联系，触类旁

通，这是目前简单的数字检索和人工智能仍无法企及的。有必备的学养也能避免研究者因为相关学科知识储备不足，对检索到的信息不能准确运用的问题。其实这也体现出中学西学的差异。傅斯年在1928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15]此说有据亦有弊，今天在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拓展古代文学研究的视域和路径的同时也要注意规避前面提到的这些问题，而规避的路径无他，唐先生所拈出的“读书”二字而已。

第三，今天的古代文学研究既重文学的“内部研究”，也重视文学的“外部研究”，探讨文学发展的外部规律，探究相关因素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形成各个学科之间的跨界融合^{[16]355-514}，无锡国专涵盖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地理、艺术等诸多领域教学内容的设置，不妨看作是对民国学术大家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闻一多诸先生学术理念、方法的吸收与呼应，在今天看来也仍显得颇有先见。

三、优游涵泳，得其深味

唐文治总结出一套被人称之为“唐调”的“读书法”。他认为读书应该通过反复涵泳，读出文章的阴柔阳刚之美。这个倡导渊源于曾国藩述姚鼐之论：“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17]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唐先生讲授古文辞时，即使是鸿篇巨制，也多亲口全文背诵，示范诵读时，抑扬顿挫，阳刚阴柔之文不同其调，让学生仿效其读法。夏承焘先生在兼职国专授课时多次听唐先生读古文，《天风阁学词日记》载：“唐蔚芝先生读《出师表》，能令人下泪。念中国文学不但诗歌有音乐性，古文品格尤高，其音乐性更微妙”^[18]，可谓知音。

唐先生之诵读不只是简单区分其音调，还重在引导学生体会古文辞音情之相得。1937年日寇入侵，上海、无锡、南京先后沦陷，唐先生于是年10月7日宣布迁校广西，与国专师生奔走道途，弦歌不辍。岁末在株洲，于旷野中朗诵《小雅·何草不黄》：“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声泪俱下^[19]。有如孔子困于陈蔡，此正所谓“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至今思之，尤为动容。这种教学方法有不可思议之功用，唐先生再传弟子陈尚君先生回忆1981年他做学位论文谈欧阳修散文的成就，经朱东润先生讲授和陈柱《中国散文史》的启示，分析《五代史伶官传序》的音节构成，程千帆

先生著《两宋文学史》特予揭出，“今知源头还在唐文治先生”。

优游涵泳，不仅可得诗文之深味，还可得生活之深味。在无锡国专，教师以学术为业，将学术生活建立在日常生活之上，以学术为乐，体悟人生的价值，感悟生命的乐趣。当下部分古代文学研究者坐拥书城而未得其乐，身心备感压力，更应学习无锡国专的这种“学术生活美学”，新一代的学生也应有这方面的熏陶。

四、会通中西，兼收并取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强势输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面临深刻危机，造成了所谓的近代中国的“文化撕裂”^[19]。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经历了从“自大”到“自弃”的急转^[20]。作为一个身负旧学又亲历西方文明的开明思想家，唐文治先生期以重振中华文化的方式救国济民，他痛切地指出：“近时毕业学子是今而非古，鹜外而以内，尊西而忘中，偶有所得庞然自大贸然自谓已足，于本国之历史掌故风尚教化茫然一无所知”^{[21]728-729}；作为应对措施，他“极意注重中文，以保国粹”^{[12]18-19}。

但实际上，唐文治并不排斥西方文明，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以三等参赞的身份随固山贝子载振赴英贺英王乔治三世加冕，此后又游历欧美诸国，得以充分了解各国现代文明^[11]。他曾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创设铁路、机电、航海等专科，课程设置仿照欧美工科大学，有的教科书更是直接购自麻省理工、哈佛等世界名校^{[21]120-128}。

唐文治先生这种会通中西兼收并取的视野和胸怀，也给予当下古代文学教学研究以启迪。在20世纪初胡适等人提倡西洋科学的方法和理论，要用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和比较的研究从事于“国学”或曰“国故”^[22]。而到20世纪90年代，则出现对西方理论的反动。存在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就是刻意与西方对抗。最为突出的，以近十年来由周宁先生和顾明栋先生提出的“汉学主义”为代表^[23]。其实在今天看来，研究理论与方法更应走向圆融自觉。虽然中西关系的问题始终成为古代文学学界绕不开的话题，但当下的研究显然更多的是超越中西对峙，广泛吸收全人类的优秀思想资源。这恰恰是唐先生所一直倡导践行的。

五、有经有权，持经达变

毋庸讳言，当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生产机制和评价体系给研究者带来了一些困扰。葛晓音先生对此曾有过思考和建议：

但是现在学科建设的标准，和以前有所不同了。

我们看每年填的表格，在数量面前人人平等：论著的数量、科研经费的数量、得奖的数量、对外合作的数量、召开研讨会的数量……热闹的结果是：我们固然催生了一些高质量的成果，但也同时制造了许多学术泡沫，更可悲的是一些“名家”学者抄袭剽窃的丑闻不断曝光。^[24]

在唐文治先生所处的时代，这样的困扰只会更多。无锡国专创办之初一直以“书院”模式运转，但这明显地与现代学校教育制度不符。壬戌学制（1922）颁布后，教育部对高等教育年限、文凭等作出相应的规定。在此背景下，唐文治带领无锡国专主动顺应形势，积极融入现代学校制度潮流。在这一点上，同样致力于复办书院的章太炎、马一浮就更显“狷介”^{[21][20-128]}。有鉴于此，当下的学术机制如何才能真正做到持经达变，道术兼容？是否可以有意识地对学进行所谓“学术生产”方面技能的培养？

以上是关于唐文治教育思想对当下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启示的一点思考，浮光掠影，敬请方家指正。

参考文献：

- [1] 戴伟华. 视野·方法：中国古代文学研究70年[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67-76.
- [2] 唐文治. 茹经堂文集[M].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 [3] 王阳明. 传习录[M]. 张怀承，注译. 长沙：岳麓书社，2020：220-221.
- [4] 王桐荪，胡邦彦，冯俊森，等. 唐文治文选[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 [5] 唐文治. 紫阳学术发微[M]. 台中：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10：244.
- [6] 吴淦南. 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1284.
- [7] 钱仲联. 人境庐诗草笺注[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 [8] 王夫之，等. 清诗话[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524.
- [9] 左东岭. 走向成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J]. 文学遗产，2019（2）：4-5.
- [10] 姚鼐，王先谦. 正续古文辞类纂[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276.
- [11] 陈尚君. 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纪念唐文治先生150周年诞辰[N]. 文汇报. 2015-11-20（18）.
- [12] 刘露茜，王桐荪. 唐文治教育文选[M].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5.
- [13] 钱仲联. 钱仲联学述[M]. 周秦，整理.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1.
- [14] 左东岭. 古代文学研究者所应具备的现代学术素养[J]. 文学前沿，1999（1）：248-252.
- [15] 傅斯年. 傅斯年全集：第4册[M]. 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258.
- [16] 梅新林，曾礼军，慈波，等. 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1949—2009）[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 [17]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M]. 长沙：岳麓书社，1987：475.
- [18] 陆阳. 唐文治年谱[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393.
- [19] 陈兴德. 近代文化思潮与20世纪科举观的形成[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47-53.
- [20] 文明国. 蔡元培自述1868—1940[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287.
- [21] 陈兴德. 一位理想主义者的教育追求——从“无锡国专”看唐文治的君子人格[J].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3）.
- [22] 胡适. 发刊宣言[J]. 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23（18）.
- [23] 张伯伟.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J]. 文学遗产，2016（3）：51-62.
- [24] 葛晓音. 让研究者沉下心来做学问——关于学科建设的一点想法[J]. 江汉论坛，2002（11）：73-74.

【责任编辑 王丽芳】

The Enlightenment of Tang Wenzhi's Educational Thought to the Ancient Literature Teaching

HUANG Liyi

(College of Humanities,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 Fujian, China)

Abstract: Mr. Tang Wenzhi is a famous educator, engineering pioneer and Sinology master in Modern China. His Wuxi Sinology special school has trained a large number of first-class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ancient literature and classical philology in less than 30 years. Wuxi National College emphasizes self-cultivation and determination, basic knowledge, self-restraint, can connect China and the west, principled and flexible, which meet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ancient literature. It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eaching methods still has profound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Key words: Tang Wenzhi; ancient literature teaching; Wuxi National College; educational philosophy